

王向远 等著

中国

1840-
1937

百年
国难

文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向远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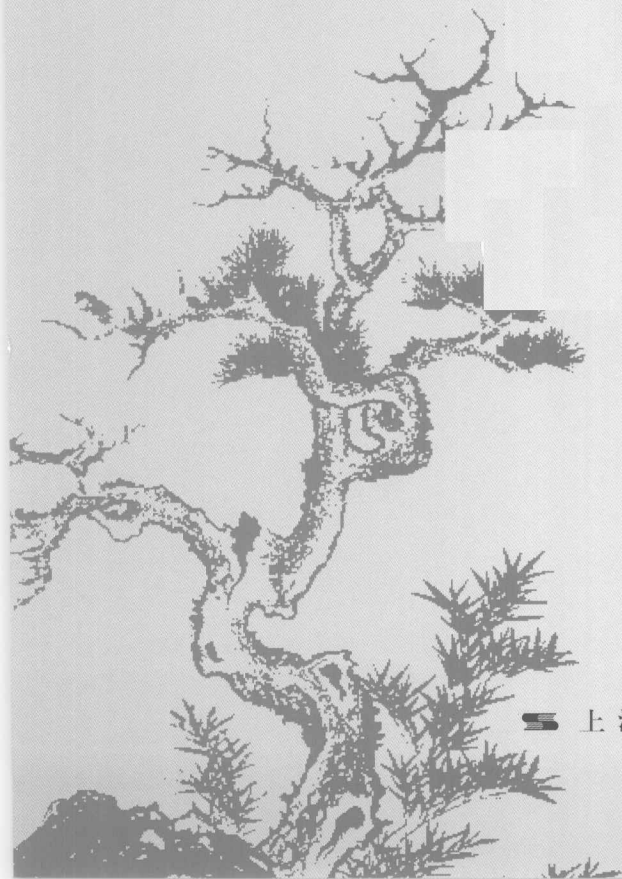
中国

1840-
1937

百年
国难

文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王向远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489-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文学史-中国-1840~1937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3444 号

责任编辑 林 青

封面设计 傅惟本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

王向远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441,000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9489-5/I·818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文学	(12)
第一节 战前烟毒泛滥在文学中的反映	(12)
一、对烟毒泛滥的忧虑与悲哀	(12)
二、对烟毒肆虐的愤怒与抗议	(16)
第二节 鸦片战争对诗坛的剧烈冲击	(17)
一、对山河沦落的震惊与愤懑	(18)
二、对百姓受难的同情与哀悯	(21)
第三节 作家诗人的讥讽与赞叹	(23)
一、对昏聩误国的谴责	(24)
二、对衰兵怯将的指斥	(26)
三、对忠臣良将、勇士义民的赞叹	(29)
第二章 中法战争文学	(33)
第一节 中法战争战记文学	(33)
一、中法战事记	(34)
二、为英雄人物立传	(38)
第二节 中法战争诗歌	(40)
一、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	(40)
二、抗法英雄的赞歌	(46)
第三节 中法战争后相关题材的小说	(48)
一、小说《死中求活》	(49)
二、几部清史演义中的“中法战争演义”	(51)
三、清史演义与谴责小说对张佩纶形象的塑造	(54)
第三章 甲午战争文学	(57)
第一节 褒贬之声	(58)
一、对“愤事误国者”的鞭挞	(58)
二、对抗战将领的赞美	(64)
第二节 悲愤之诗	(66)
一、诗人的哀叹	(66)

二、黄遵宪的甲午组诗与丘逢甲的“失台”之痛	(71)
第三节 幻灭与反思	(74)
一、对日观念的形成与幻灭	(74)
二、文学的反思	(78)
第四章 庚子事变文学	(82)
第一节 庚子事变文学中危机四伏的晚清社会	(82)
一、晚清“教案”与义和团	(83)
二、宫廷党争与“北战南和”	(86)
第二节 庚子事变文学中的末世官僚群相	(90)
一、慈禧太后的形象	(90)
二、文武官僚群像	(92)
第三节 庚子事变文学中的众生世相	(100)
一、狂热抗争的义和团	(100)
二、不幸不争的老百姓	(105)
第四节 庚子事变文学中的八国联军及洋人	(107)
一、八国联军的暴行	(108)
二、“洋鬼子”的另一面	(111)
第五章 “二十一条”国难文学	(114)
第一节 “二十一条”国难纪实文学	(115)
一、“二十一条”国难纪事	(115)
二、“二十一条”国难散文	(121)
第二节 “二十一条”国难小说	(125)
一、文言短篇小说	(125)
二、历史演义小说	(130)
第三节 “二十一条”国难诗歌	(135)
一、爱国救亡诗	(135)
二、讽刺谴责诗与战歌	(138)
第六章 “五卅”及 1920 年代国难文学	(142)
第一节 1920 年代的国难文学	(143)
一、1920 年代前期的国难文学	(143)
二、1920 年代后期的国难文学	(148)
第二节 “五卅”诗歌	(150)
一、激昂高亢的战歌	(150)
二、哀吊与反思之诗	(153)
三、通而不俗的歌谣	(156)
第三节 “五卅”散文、小说与戏剧	(162)
一、充满临场感的散文	(162)

二、小说的多侧面叙事	(166)
三、戏剧文学的现实性与先锋性	(172)
第七章 “九一八”国难文学	(178)
第一节 报刊上的“九一八”事变	(178)
一、报纸上的“九一八”事变	(178)
二、“九一八”事变与文学期刊	(180)
三、文学家对“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	(182)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与各体文学创作	(184)
一、国难小说	(184)
二、国难戏剧	(186)
三、国难诗歌	(189)
四、国难主题的报告文学与散文	(196)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沦陷区文学	(198)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坛	(198)
二、小说、戏剧、诗歌	(201)
三、“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流亡作家群	(206)
第八章 “七七”国难文学	(210)
第一节 “七七”战事报告文学与散文	(210)
一、战事报告文学	(211)
二、报刊社论与时评	(216)
第二节 “七七”国难诗歌	(220)
一、国难纪事诗	(220)
二、抗战救亡诗	(225)
三、英雄颂歌及哀悼诗	(229)
四、抗日歌曲和时事鼓词	(231)
第三节 “七七”国难戏剧	(233)
一、戏剧文学中的前线与后方	(234)
二、国难戏剧的宣传性与艺术性	(238)
第四节 “七七”国难小说	(241)
一、纪实性短篇小说	(241)
二、集体创作《华北的烽火》	(244)
参考文献举要	(250)
后 记	(262)

绪 论

一、作为文学史范畴的 “百年国难文学”

本书题名《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关键词是“百年”、“国难”、“国难文学”等，对此需要首先加以界定和解释。

所谓“百年”，指的是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为止的大约一百年。这一百年横跨了通常所说的“近代”与“现代”，但本书没有使用“近代”、“现代”或“近现代”这样的术语。众所周知，“近代”、“现代”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从历史科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近代”、“现代”是当下人站在自身立场上对晚近的称谓，而难以成为一个恒定的历史区间称谓。例如唐代人所说的“近代”，我们今天看来早已经成为“古代”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现代”，再过多少年，在后人那里也会成为“古代”。因此，今人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断代史的研究，要想把所研究的那段历史客观地置于整个历史链条与发展序列中，就应该逐渐少用“近代”、“现代”这样的表述，而使用更具有客观性的时间表述。有鉴于此，本书在研究中国的国难文学的时候，采用“百年”这样时间概念，来指称1840年至1937年的一百年时间。

“国难”一词是古汉语固有词汇，例如《汉书·翟方进传》中就有“国难”一词，三国魏曹植有诗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里的“国难”皆指国家危难。在中国历史上，大范围持续的天灾人祸，包括外族骚扰入侵、暴民蜂起、地方叛乱、军阀混战、宫廷政变等，都被视为“国难”。但中国历史上的“国”或“国家”的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相去甚远。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乃至将帝王直接称为“国家”。“国家”不是天下人的国家，而是统治者的领地与私产。因此，尽管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国难”，但内乱之“难”基本上是统治者之“难”，而未必是寻常百姓之“难”；只有外乱（外族入侵）之“难”，才是“国难”。中国历史上由外族入侵、乃至外族入主所导致的国难，对官民上下造成的苦难与冲击甚为剧烈，特别是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外族入主中原造成了改朝换代与社会动荡，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国难”，对此，那时的士大夫阶层有大量抒写国破家亡的诗文，如唐宋时代的边塞诗，而民间下层百姓则有大量的演义小说、通俗小说，如明代的《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等表现丧家之痛与保家卫国之情，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国难文学”。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朕即国家”的政治体制下，“国难”本质上是“君难”（君王之难），有时客观上甚至会转化为“国幸”。历史上的暴民起义是“国难”，但每每导致腐败朝廷的灭亡；历史上的外族入侵、入主是“国难”，却往往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国家版图的扩大，入侵者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却很快被强韧的中华文化所战胜、所征服，中华文化反而因此而发扬光大。再从文学史上看，那些宋元明清时代的反映国破家亡的“国难文学”，与其说反映了国家危难，不如说反映了改朝换代的不适与痛苦；与其说是叹惋社稷国家的崩坏，不如说叹惋朝廷皇帝的覆亡；与其说表现了具有国家主人公意识的爱国主义，不如说是表现了具有忠君意识的皇权主义。换言之，那时的作者与读者的“国”及“国家”的观念，还没有超出君权思想的范畴，还没有确立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

识,还没有形成国家主人公的立场。另一方面,那时的相关创作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空间与时间的传播上也是有限的,未能成为一股持续的有时代性的创作潮流。故而,那时的“国难文学”不是我们所界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难文学”,而只是古代的“边塞文学”、“战争文学”或“征战文学”。可以说,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国难”史是1840年后的百年史;在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上,严格意义上的“国难文学史”,是1840年后一百年间的以“国难”为主题的文学史。

1840年以降的一百年,事件频仍,国难不断,就重大事件而言就有十几次。其中最重要的是1840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1882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庚子事变”,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5年的“五卅”事件、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从1848年到1937年,九次重大的国难事件,正好历时一百年。这一百年是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施加侵略、中国不断被动挨打、国家多灾多难的一百年。百年间官民都有不断的抵御抗争,但由于国家政治体制落后、官僚腐败,统治者凝聚力与领导力贫弱与丧失,民众觉悟程度与发动程度有限,抵御乏术,抗争无力,往往焦头烂额、内外交困,前门来狼,后门进虎,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任人宰割,辱国丧权,不但国将不国,连中华历史文化的价值与传统也面临着被冲击乃至被颠覆的危险。这一灾难的深刻性、持续性、全面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当以“国难”或“百年国难”一言以蔽之,反映这一时代的文学,就是“国难文学”或“百年国难文学”。

我们将1840年至1937年的一百年界定为“百年国难”时期,进而将1937年7月“七七”事变作为“百年国难”的下限。换言之,我们将“百年国难”与“八年抗战”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这样的划分基于如下的判断:“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八年抗战”时代。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国难事件,但同时也是“百年国难”的转折点。面对被侵略者置之死地的深重民族危机,不得不做“最后的一战”,开始从根本上摆脱百年来步步退让、被动挨打的局面,而进入共赴国难、浴火重生的历史时期。从此,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地不分南北、党派不分左右、人不分男女老幼,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由此,中国历史也从“百年国难时代”而进入“八年抗战时代”。“国难时代”与“抗战时代”固然是一个先后连续的过程,却有着颇为不同的时代特点。“百年国难”的本质是苦难,“八年抗战”的本质在于抗争;“百年国难”时代固然在苦难中也有抗争,但抗争乏术乏力、态度消极被动,而“八年抗战”时期固然也有多次国难事件(特别是日军实施的南京大屠杀等大规模屠杀事件),但“八年抗战”时代的总特点是奋起于国难,上下同心,决死奋战,最终,我中华民族由抗战而获新生。与“百年国难”与“八年抗战”同样,“国难文学”与“抗战文学”也是一个先后相继的过程,同时也有着明显不同的内涵与面貌。

“百年国难”与“八年抗战”的时代划分,也完全适用于文学史,由此可以划分出“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历史阶段、两种文学形态。这样的划分尊重了时代的本质的统一性与相对完整性,避免了以政权更迭、党派兴起为依据划分文学史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在以往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撰写中流行的按王朝更替来划分的历史著作模式中,“清史”只能包括“百年国难”的前半部分,“中华民国史”只能包含“百年国难”的后半部分。后来使用的“清末民初”这一复合概念,一定程度地避免了两分的尴尬,但“民初”一般限定在1919之前,“百年国难”仍然被从中切断。在以往的“近代”及“中国近代史”的界定、划分与相关著述中,将1840年作为近代史之始,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或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作为近代史之终,这样仍然将“百年国难”从中间截断,去掉了后半部分;而以往的“现代”及“中国现代史”的界定、划分及相关著述,均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或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于是“百年国难”的前半部分就被切断。历史阶段与历史形态的划分可以根据研究的对象、课题与研究的目的宗

旨,而采取多种不同的角度,寻找不同的切入点,使用不同的划分方法。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百年国难”史研究而言,以往的历史阶段划分模式都不太适用,应该使这一历史阶段的叙述与书写保持其应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而对于“国难文学史”这样的专题文学史研究而言,我们有必要以“百年国难”为依据,确立新的、相对独立的文学史叙述区间与话语空间。

以上我们已经在纵向的、动态的时序上,为“百年国难文学”划分出了存在区间,还有必要在语义学的意义上,为“国难文学”确立静态的存在空间。为此,就要厘定“国难文学”与此前使用的两个相关概念——“反侵略文学”、“爱国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确立“国难文学”概念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不少研究者使用“反侵略文学”这一术语,来指称1840年之后的相关文学。例如,1938年阿英先生编纂出版了《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全四卷,北新书局版)。1957年至1960年该套丛书增订为五卷(增加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一卷),由中华书局再版的时候,更名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此后直至现在,“国难文学”一词基本上成为死词而不被使用,“反侵略文学”却被经常使用。然而实际上,“反侵略文学”这一术语虽然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百年国难文学”的内容,但并不严密、并不周延。从内容上看,与其说“百年国难文学”反映的是“反侵略”,不如说是更多反映的是“侵略”,更多地描写帝国主义列强如何侵略中国,如何给国家与国人带来种种灾难。“百年国难文学”对“反侵略”固然也有不少描写,对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人物固然也有不少的赞颂,但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了一些当权者如何昏庸误国、如何退让妥协、如何放弃抵抗、如何卖国,抒发的主要不是反侵略的豪情壮志,而是国破家亡的愤懑与悲哀。概而言之,更多地描写的是“国难”,而不是“反侵略”。“国难”是消极被动的承受,“反侵略”是积极主动的担当。因此,“百年国难文学”的实质在于“国难”,而不在于“反侵略”。实际上,“国难”一词在“百年国难文学”史上早就有人使用,“国难小说”、“国难诗歌”之类的称谓在当时的报章书籍上被经常使用,阿英先生早在《近代国难史丛钞》中就使用了“国难”一词,来概括指称相关文献史料。而“反侵略文学”一词作为一个文学术语在“百年国难文学”史上的相关文献中殆无所见,也很难找到。

但相同的问题,却又以不同的方式困扰着主流政治观念的逻辑,那就是“爱国主义”。长期以来,更多人使用“爱国主义”一词来指称“百年国难文学”史上的相关作品及文学现象。“爱国”是个古老的词汇,《战国策·西周》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这里的“爱国”指当时的诸侯国,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爱国”的“国”有着种种不同的内涵,例如屈原的“爱国”爱的是他所属的封建诸侯国,陆游的“爱国”爱的是大宋王朝,林则徐的“爱国”爱的是大清帝国。历史上,“爱国”总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称为“忠君爱国”。除去所“忠”之“君”的不同,“爱国”指的都是一种爱家乡、爱故土、爱父老、爱国民的高尚情操。而后来在“爱国”一词基础上合成的“爱国主义”一词,是一个相当具有现代性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和现代国家意识。在国内政治的语境中,“爱国主义”的前提是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认同;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爱国主义”往往具有鲜明的对外指向,激进的“爱国主义”常常被视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同义词。在国际政治语境中,“百年国难文学”无疑是“爱国主义”的,因为它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但从国内政治的语境中来看,“百年国难文学”常常并不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认同,更多的是反思、批判与否定。例如,对清政府、对北洋军阀政府,“国难文学”都做过激烈的批判。从今天完全超越的立场来看,批判腐败政府无疑是“爱国”的表现,而在当时,这些批判者却常常被政府当局视为“国贼”,因为“国难文学”家们并不认同统治者之“国”。的确,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或“国家”并不只是指代国土、国民,也指统治国土、管理国民的国家政权,因为“国家”首先是以制度和暴力来维持的政权实体。这样,“爱国主义”所爱者,不仅仅是国土、国民,也应包括统治国土与管理国民的国家政权。从这个角度看,“百年国难文学”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文学”,“百年国难文学”的许多作品名称中,常常带有“痛”字、“恨”字、

“难”字,因而与其说它们是“爱国主义”文学,不如说是“痛国”、“难国”的文学,更准确、更概括地说,就是“国难文学”。当然,“爱国主义文学”这一术语今后当然可以继续使用,但“爱国主义文学”只能在一定意义上用作泛指,而“国难文学”或“百年国难文学”则是一个具有特定时序的、历史的、文学史的、学术的概念,“爱国主义文学”最多只能包括、但不能替代“国难文学”或“百年国难文学”。

总之,“百年国难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它是特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是国难时代的产物。“百年国难文学”是那一百年的文学主流,最能概括体现那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质与特点。

二、“百年国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百年国难时代,每一次重大的国难事件都伴随着大量相关的文学作品出现。围绕着相关事件而产生的大量诗歌、政论、传记、戏曲、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及具有一定文学性的非纯文学作品,真实反映了历次国难事件的全过程,描写了国家与民众的苦难,发出了反抗的呼声,并痛定思痛,对国家前途命运、国民性格等问题作出了反省与思考,有些作品还表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与自觉的世界意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

回顾以往的学术史,学者们对百年国难文学进行研究,大致开始于“百年国难”时代即将结束、而“八年抗战”时代全面展开之时。当人们把上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和“历史现象”进行观照与研究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被研究的那个时代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已经形成了心理上的客观距离,具备了研究的主观心境与客观条件。著名文学家、学者阿英最早着手对“国难文学”进行研究。1938年,阿英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其中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共四种资料集,还编写了《近代国难史籍录》、《中英鸦片战争书录》、《甲午中日战争书录》、《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书录》、《国难小说丛话》等一系列书目集。这些资料的编纂,为中国百年国难史及百年国难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示范了文史结合、以文证史、以史论文的研究方法。阿英为各卷撰写的序言,将各次国难文学的来龙去脉、基本特点,提纲挈领地加以梳理和分析,可以说是研究该问题的高水平的系列论文。除了编订多卷本的国难文学集外,阿英还根据自己多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①一书,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35年日本增兵华北近一百年来来的国难文学,可惜该书稿已经遗失,仅留下了《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自序》。在这篇序言中,阿英回忆了1839年到1935年间的国难大事,分析了国难文学的形成,认为“一百年来我们有无数的作家,用着文学的各种各样形式,在不断地表现自己的愤怒,喊叫,促使广大民众的觉悟,直接间接的传达出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声音。”并呼吁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学史家重视这种特殊的文学,称

^① 阿英在该书中使用的“国防文学”一词带有时代印记,显然与1934年至1936年间左翼评论家周扬从苏联引进并加以提倡的“国防文学”有密切关联,该词当时在文学评论界曾引发争议。后来阿英不再使用“国防文学”,而使用“国难文学”这一概念,两个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

这种文学“真正能代表中华民族的‘魂’”。^①然而,阿英以降,由于种种原因,“国难”一词近于死词,对百年国难文学的研究十分冷清,迄今为止,关于国难文学的专门的研究著作一本也没有。对各次具体的国难事件及国难文学的研究也很不平衡,但也多多少少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陆续地出现,以下加以简要回顾和评述。

首先,关于鸦片战争文学。

我国学术界对鸦片战争这一段历史的整理与研究已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出现了许多有价值有分量的著作,但相对而言,对于鸦片战争文学进行系统地搜集、整理和研究,尚是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国内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及教科书以及相关文章,大多止于对该时期重点诗人诗作加以评介,其他少有论及。最早对鸦片战争文学进行搜集整理的,当属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后的两位有心人——《射鹰楼诗话》的编者林昌彝和《咏梅轩杂记补遗》的编者谢兰生。他们收集了不少反映这一重大事变的诗文、奏疏、书牋、传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鸦片战争文学的面貌。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阿英搜集整理编辑了《鸦片战争文学集》。此后相关研究寥若晨星。从1970年代以后至今,研究文章增多,洪克夷、黄澄河、王飏、魏中林等陆续发表了从整体上论述鸦片战争诗歌的论文。进入19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角度趋于多样,如龚喜平在《论鸦片战争诗潮的“诗史”特征》一文中,提出了“鸦片战争诗史”的概念。武卫华的《诗的新变:鸦片战争对近代诗人心态的撞击》一文,采取的是心理学的视角。总体上说,关于鸦片战争文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研究的对象大多集中在鸦片战争诗歌上,对反映鸦片战争的小说、戏剧、散文、战地笔记等鲜有涉及。研究的时段亦集中在鸦片战争的战时文学,而对战前和战后相关的作品缺乏必要的观照。可以说,对于鸦片战争文学这一诞生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来说,研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远不够。

第二,关于中法战争文学。

迄今为止,对中法战争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只有阿英的《关于中法战争的文学》(《中法战争文学集》序言)一篇文章,是一篇概述性的专文。直到1980年代后,一些以近代“战争文学”、“爱国文学”为主题的个别文章中也提到中法战争文学中的相关诗人及其作品。如魏玉川的《论中国近代诗歌的爱国主题》(《唐都学刊》1998.1)提到了刘永福、冯子材这些中法战争诗歌中所塑造的“国魂”人物,方建春的《中国近代诗歌中的忧患意识与尚武精神》(《固原师专学报》2000.4期)对中法战争结束后康有为所作的《闻邓铁香鸿臚安南画界撤还却寄》给予注意。在有关近代诗人及诗歌作品的研究文章中,对黄遵宪有关中法战争主题的诗歌论述稍多,但对其他诗人的论文很少。只有如张修龄、马卫中的《文字自有真,悬为万人趋——试论刘光第〈介白堂诗集〉》(《宁夏大学学报》1991.2)、方志钦的《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岭南文史》2002.3)、李文初的《如何评价郑观应的诗歌》(《岭南文史》2003.1)、韦华雄、陆宏辉的《浅析刘永福的长恨诗》(《曲靖师专学报》1993.4)等有限的几篇文章。在近代小说的整体研究中,对中法战争的小说涉及更少,其中陈颖的两篇文章——《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概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4)、《中国近代反侵略小说综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2)——提到了《死中求活》等涉及中法战争的小说。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对中法战争文学的研究严重不足。

第三,关于甲午战争文学。

阿英之后,对甲午战争文学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不多,没有专门著作,论文数量有限,选题角度不丰富。其中,李侃的《甲午冲击在思想文学领域引起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84.5)是同类文章中较早的,但不属于专门的文学研究。蔡国梁的《甲午战争的重现——〈中东大战演

^① 原载1936年6月17日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后收入《阿英全集·附卷》。

义》)(《河北大学学报》,1988.2)作为甲午战争文学的个案研究,对反映甲午战争的惟一的一部演义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考察和分析,但角度及结论似嫌陈旧。1994至1995年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之际,李生辉、孙燕京、裴效维、张海珊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是甲午战争文学研究成果发表密度最大的两年,可以看出,这些成果绝大多数论述的是甲午诗歌,而小说、散文、战地笔记等其他文体样式被忽视。实际上,不同的文体样式构成了甲午国难文学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对此应该做全面立体的研究。此外,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也有大量相关作品,亲历过战争的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等也留下了关于战争的记录和评论,研究中国的甲午国难文学,如果能和其他国家有关甲午战争的作品加以参照,必然会有助于呈现中国甲午战争文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第四,关于庚子事变文学。

早在1925年郑振铎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题为《叙拳乱的两部传奇》一文,向读者推荐林纾的《蜀鹃啼》和陈季衡的《武陵春》,此后一直未见有人做相关文章。阿英编选的《庚子事变文学集》两卷及《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一文,是庚子事变文学研究的起点,但在阿英之后,从“国难文学”的角度出发,对庚子事变文学加以研究的很少。这与历史学及宗教研究领域出现的大量相关成果形成了对比。直到1960年代,义和团运动时期民间流传的歌谣、揭帖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报纸和期刊上相继出现了专论义和团歌谣的文章。进入1980年代后,关于庚子事变的诗词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如1983年3月《学术论坛》上刊登了梁球的一则短文,认为《庚子国变弹词》是“最早的长篇反帝文学作品”。1988年3月《广西师院学报》刊登了马飏的文章《试论王鹏运的〈庚子秋词〉》,从内容和艺术特点两个方面对《庚子秋词》作了分析。1990年代以后,描写庚子事变的小说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如陈颖的《中国近代反侵略小说综论》(《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97.2)提到了《邻女语》、《京华碧血录》。朱德慈发表于2003年《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上的文章《〈邻女语〉新论》,将小说《邻女语》归为谴责晚清政治的小说加以论述。综合来看,与庚子事变文学作品的丰富性相比,相关研究还是零星的、不系统的,研究的范围狭窄,角度也嫌单一。

第五,关于“二十一条”国难文学。

与上述各种国难文学的研究相比,“二十一条”国难文学的研究更为薄弱。阿英所编的《近代国难史丛钞》中包括了“二十一条”方面的作品,但当年阿英并没有编出独立的“二十一条”文学资料集,使后来的研究更为缺乏基础、缺乏参照。从阿英的《〈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自序》一文中看,他的“国防文学史”应该包括“二十一条”国难文学的相关内容,但由于该书书稿遗失,无以窥知。阿英之后,“二十一条”国难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一片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基本上作为是一个外交事件进行的,青岛之战也只局限在山东一省。虽然,作为“民国第一大外交事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在当时的反响异常强烈,对国人的心理冲击极其巨大,朝野上下、布衣百姓无不感到亡国灭种的危险,读一读我们将要论述到的文学作品就会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但与此前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相比,在历史的纵深度上,“二十一条”国难对中国民众与社会的冲击的剧烈程度略逊一筹。特别是,中日由“二十一条”交涉而签订的“民四条约”并未完全付诸实施,并于1923年最终废除。这样,在后来人们的心目中“二十一条”交涉在历史上的影响似乎并不很大。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后,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及其文学反响的历史记忆逐渐淡薄下来。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现象:“二十一条”国难文学很丰富,却长期无人发掘整理,更不用说系统深入的研究了。

第六,关于“五卅”及1920年代国难文学。

1920年代,以“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等具体的国难事件为触发点,以诗歌(包括白话新诗与旧体诗)、散文、小说、歌谣小调和戏剧等文学体裁为形式载体,形成了以“五卅”国难为主的1920年代的独具特色的国难文学。最早从“国难文学”的角度论及“五卅”及1920年代文

学现象的还是阿英,他曾在《一百年来的国难诗歌》(《阿英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的部分章节中做了一定论述,并将“五卅惨案”单列一节,分析了郑振铎、朱自清、王统照、焦菊隐、蒋光慈等人的诗歌。但阿英的政治倾向的限制使他的视野始终局限在左翼作家阵营中,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包括来自对立阵营的国难文学创作。19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最突出的是许豪炯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特别是他在1997年出版的专门著作《五卅时期文学史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该书以“五卅”时期为取材的时间范围,对当时反帝反军阀的进步文学做了梳理、评述。但全书仍然承续此前主流文学史的视角,即以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为绝对标准与最终旨归,研究涉及的均是文学史上读者耳熟能详的大作家,而没有对更大视野中的五卅时期文学做出搜集与评述,而作者所引以为自豪的“资料详备”也未必尽然,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五卅运动史料》(两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虽也收集了部分文学作品,但主要以纪实类和当事人的回忆居多,在文学性上并不突出。此外,还有一些单篇文章从微观角度来赏析“五卅”时期出现的一些名家名作,但这些论文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而已,并不具备“国难文学”的视角。总之,以“五卅”国难为中心的1920年代国难文学虽然量大质佳,但对其研究却相当不够,从“国难文学”的角度加以研究者,更是乏善可陈。

第七,关于“九一八”国难文学。

对“九一八”事变及“九一八”相关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的研究,与上述历次国难文学比较起来稍微多一些。关于“九一八”国难对当时文坛与文学的影响,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就有论述。例如:钱歌川著《现代文学评论》^①,收《九一八与日本文学》等十一篇论文;李何林编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②的第三编收《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艺思潮》;蒲风著《现代中国诗坛》^③其中一章写的就是《九一八后的中国诗坛》,等等。后来的研究主要是将“九一八”事件作为东北沦陷、日本侵华及整个中国抗战文学史上一个组成部分,在相关的著作如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冯为群、李春燕的《东北沦陷区文学新论》、张毓茂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刘中树的《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等中给予或多或少的论述,但并没有将“九一八”事件本身作为中心、从国难文学的视角进行相对独立的“九一八”国难文学的研究,因此研究的规模、广度和深度都颇受限制。从文献的角度看,研究者很重视名家名作,但对非名家名作有相当文史价值的作品收集不够,对当年刊载有关作品的相关报刊杂志的收集尤其不足,因此,很需要将“九一八”文学作为“百年国难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相对完整独立的研究。

第八,关于“七七”事变文学。

“‘七七’事变文学”是“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的交叉点,长期以来,研究者都将“‘七七’事变文学”作为抗战文学的起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在抗战期间已经广泛展开,战火硝烟中诞生了像《救亡日报》、《文艺阵地》这样的报刊,除了刊载文学作品外,就抗战文学也做了较多的理论研究,论著《抗战期间的文学》、《抗战期间的戏剧》、《抗战期间的报告文学》也连续出版。但这一时期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为抗战服务,所以大多数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鼓动民众和文人抗战,而无暇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当年阿英编纂《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没有将“‘七七’事变文学”编纂成集,他的已经遗失的《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一书论述的下限是1935年日本增兵华北,而未及“‘七七’事变文学”。主要原因是当时事变刚刚爆发,有关作品尚待沉淀而未能文献化。抗战结束后很快又爆发了内战,战事

① 钱歌川:《现代文学评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上海:生活书店,1940。

③ 蒲风:《现代中国诗坛》,诗歌出版社,1938。

频仍,相关研究难以展开,唯一可道的相关成果是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可以说是对抗战文学比较完整的总结,全书主要按体裁进行研究,特别将“通俗文学”单独列为一章,体现了作者敏锐的眼光。新中国成立后,抗战文学的研究更加繁荣,不仅有专门期刊,大量的研究专著、乃至研究丛书也开始相继面世。其中,苏文光的研究最为突出。但另一方面,抗战文学研究亟须新的视角,新的切入点,正如秦弓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抗战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去做,诸如一些事件(如南京大屠杀,日军细菌战毒气战,重庆大轰炸,汪精卫投降等)在文学中怎样表现的,文学表现与历史事实是否吻合,不同方面(敌我双方,我方各派)的表现有何差别。”^①以具体的事变、事件为中心、以“百年国难”及“百年国难文学”的视角,对“‘七七’事变文学”——更确切地说是“‘七七’国难文学”——进行较为系统的资料发掘利用和再研究,对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化,是十分必要的。

三、“百年国难文学”研究的 障碍困难与应有的思路方法

综上所述,与“百年国难文学”相关的研究,虽有一定的基础,但还很薄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学界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相当重视,但对属于“中国近代文学”范畴的“百年国难文学”研究,却没有在半个多世纪前阿英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因为有种主观上的障碍与客观上的困难。

首先是文学史研究的“视角滞定”问题。

所谓“视角滞定”,就是在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使用某一两种视角而不加改变,久之成为僵化模式。最为流行的“视角滞定”大概有三种。

一种是“通史视角”,即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采用的是中国文学通史的视角。表现在文学史阶段划分上,就是将中国的改朝换代、中国的政权更迭甚至外国的政权更迭(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划分文学史各阶段的基本依据,具体到1840年后的百年中国文学史,则以俄国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为界,人为地割裂为“近代”与“现代”前后两个部分,使百年文学在历史叙述与逻辑链条上产生了阻隔与断裂,弱化了其连贯性与联系性。另一方面,回归到文学本体,则将语言与文体的演变与转换作为文学史矛盾运动的基本动力,于是近代一百多年的文学史,被划分成用文言及传统文体写作的“旧文学”,和使用白话文及新文体写作的“新文学”两个部分,并从这一角度展开论述。“通史视角”常常不得不将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作品纳入统一的模式中加以分析评价,最为流行的评价模式就是“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二分法。而对“思想内容”常根据既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出“积极—消极”、“进步—反动”或“革命性——局限性”等等判断,具体就是指出某作家作品“歌颂”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同情”了什么,“表现”了什么。“艺术特色”一项则要说明某作品“故事情节”如何生动,“人物形象”如何鲜明,“语言”如何优美之类。在这种话语模式中,不管什么作家的什么作品,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作品,都会被分析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内容”,以及其实没有什么特色的“艺术特色”。每一作家作品被分析出的彼此相同或相通“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越

^① 秦弓:《抗战文学研究的概括与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多,它越是经典之作。而以这种模式来评价“百年国难文学”,“思想内容”上常常是灰色绝望的、消极的,政治上常常是对腐败反动当局抱有幻想的,对洋人的认识常常是矛盾的乃至糊涂的,民族意识常常是狭隘的,文化立场与思想观念常常是保守的和落后的,阶级意识常常是不自觉的和模糊不清的,结论自然是“价值不大”。而在“艺术特色”方面,由于是在“国难”时代的特殊环境或心境下产生的作品,大多并不是为纯审美的目的而写作,在艺术技巧上自然就缺乏“生动”、“形象”、“优美”之类的艺术魅力。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一般的中国文学通史与近现代文学断代史中,涉及历次“国难”的作品,除了一些名家的作品被提到之外,大量的一般作者的一般作品自然就会被忽略。

第二种“滞定视角”是“审美至上主义”。“审美至上主义”是1980年代以后流行的一种观念,是对19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及文学理论所主张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思想倾向至上”的文学价值观的反拨。改革开放前,人们判断一个作家作品的价值,主要看他(它)的政治思想倾向;改革开放后,许多人的文学价值观由“思想倾向本位”转向了“艺术性本位”,或者说,倾向于采取“纯文学”的价值观,以“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作为衡量作家作品的标准。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坚持得太僵硬,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容易从一种狭隘走向了另一种狭隘,对文学研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具体到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大量的研究者都盯着那为数有限的名家、名作,而有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从纯文学的、纯艺术的角度来看,价值不够大,所以不被重视。“百年国难文学”的大多数作品,大多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在文体上也是新旧交叉,不够经典,故而用“审美至上主义”的价值观来衡量,有的或许不值得在文学史上加以书写。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作品却有着某些“纯文学”的“纯美”的作品所不具备的历史文献学价值、社会心理学价值、文化学价值、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价值。换言之,如果我们的文学价值观更开放一些,站在文化学的角度看,则“百年国难文学”史上那些被一般研究者、被流行的文学史所忽略、按下不提的相关作品,却有着那些纯文学所不具备的特殊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三是单一学科视角,这主要是由学科划分所造成的。近百年来,在外国学术体制、大学分科的影响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地抛却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这固然是学术精细化的一种进步,但矫枉过正,过于僵硬,常常走向学科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分工乃至分离,使学者的格局、心胸和气魄受到限制,学术研究的深广度受到制约,造成历史、哲学、宗教研究者可以不问文学,文学研究者可以不问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早在1936年,阿英就在《〈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自序》中说,我们的文学史家“一向只会评文章的优劣,争辩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早都有‘国家事,管他娘’的成见在胸”,因而对近代百年间的丰富多彩的国难文学的研究不予重视。实际上,历次“国难”形成都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与背景,“百年国难文学”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超越文史界限的跨学科研究。它属于历史学的研究,属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属于军事学与战争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更属于文学史的研究。假如文学史研究者太过坚持“文学学科”本位,便不会涉足其他学科而研究“国难”文学;假如历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太过坚持史学本位,那么也就不会涉足文学并且去研究“国难文学”。

第四个原因是文献学层面上的。

对“百年国难文学”的研究而言,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一个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披沙拣金的繁重工作。

相关文献资料数量庞杂、散乱而缺乏整理,这和古代文学的文献资料的状况十分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历史长,关注的人多,资料积累比较丰富,以“四库全书”为主的各种丛书、全集、别集都有出版,也较容易找到。近代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的文集从未出版过,即使已经刊刻的,有些今天也已很难看到,而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又散布在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兵荒马乱的年代,物质匮乏、

纸价昂贵导致作品印数少,纸质差,不利于保存,导致资料大量遗失,许多作品分藏在各地(如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收集整理极为不便。蒙树宏在《云南抗战文学园圃漫步散记》一文中,谈到搜集抗战时期的书籍和报刊时曾感慨说:“寻找这些出版物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其印数少,流通面不广;二是因为多为土纸本,纸质差,不易保存;三是因为编、著者生活动荡,或因政治运动的缘故,或因后代的兴趣不同,所藏或被销毁,或作为废品加以处理;四是因为后人重藏不重用,让它们沉睡书橱,隔断了和读者见面的机会,或以为奇货可居,秘藏不露,索要高价。”^①此言甚是。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将“百年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文学史、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的文学现象、作为文史交叉的特殊文学类型,从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及跨学科、“超文学”研究的角度进行系统、完整、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

为此,“百年国难文学”的研究不但要克服上述僵化的文学史观念,解决文献资料收集难的问题,还要拥有明确的研究性质、研究思路,使用恰当切实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对象的性质上,《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的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的专题史研究、专门史研究。作为“专题史研究”,既要有“史”的意识,更要有强烈的“题”(问题)的意识。必须仅仅围绕“国难”这一主题,收集、吸附、消化资料,明确意识到专题史与“通史”或一般断代史的取材方法不同,文学通史及一般的文学断代史,目的是以“文学性”为价值尺度,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做出审美价值的判断,并予以定性定位,而“百年国难文学史”的主要目的,是从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性与文学色彩的相关文献中看“国难”,因此在取材和立论方面都要具有“事件中心”的意识。凡是描写“国难”题材与事件、反映“国难”主题的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色彩的文献,都应纳入研究的视野与范围。而判断“国难文学”价值高低的标准,不仅仅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而是文学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统一、当时影响力与后世生命力的统一。在国难文学的文本解读与文本分析中,要看作家作品对某次国难事件反应的速度与敏锐度、观察的角度与高度、思考的深刻度、描写的全面度、情感表达的契合度与共鸣度、传播过程的时效性与感召度,并依此评价他(它)们各自的文学史价值,进而对国难文学中所蕴含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这样写出来的“百年国难文学史”,既可以弥补一般近代史研究、国难史研究中重视一般史料,而忽视或不太顾及“文学”性文献的不足,也可以弥补一般文学史著作过分注重审美价值而相对忽略历史文化价值的缺憾。换言之,“百年国难文学”的专题研究,应该采用许多学者已经成功运用的“以诗证史”即“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历史学印证文学,使文学文本获得史料价值;以文学文本的形象性、细节性补充一般史书、史料的平实叙事方式之不足。“文史互证”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

“百年国难文学史”的研究,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则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涉外文学”研究。我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一书中曾提出:在各国文学当中,凡涉及“外国”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归为“涉外文学”的范畴。由于“涉外文学”所具有的跨文化、跨国界的性质,我们把“涉外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的对象或课题之一。^②中国的“百年国难”特别是重大国难都是“涉外”的,而中国的百年国难文学史,也是“涉外文学”。“涉外文学”研究本质上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因而研究百年国难文学史,应该采取“涉外文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注重“国难文学”中反映的一些跨文化现象、跨文化心理,注意揭示“国难文学”中的传统文化成见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注意“国难文学”作品中外国描

① 李建平、张中良:《抗战文化研究》(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40页。

② 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第234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写、外国人形象描写及涉外评论中的社会语境、感情趋向、时空视差、文化心理,以便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国人的感情与心态在中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剧烈冲突时代、在灾难频仍时代的起伏、震荡、失衡、调试与变化。这样,《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也就成为跨文化的、“超文学”的、比较的文学史,成为特定时代、特定角度的中外关系史。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虽然有阿英等前辈学者开辟了研究道路,但进一步全面收集、整理原始资料,并写出系统的专题文学史,本书尚属首次尝试和草创。而且,文学史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特别是“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这样的专题文学史,更是基础的基础,因而本书不同于高深的思辨性理论著作,不必追求新名词、新概念的大量使用和观点上的标新立异,不必做过度抽象的理论阐发,而是将“百年国难文学”的相关知识加以发掘、整理、统合,使之系统化,为此就要重视文献资料的丰富翔实,重视稀见文本段落的征引,重视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而尽力使本书成为一部资料丰富、知识可靠、角度独特、风格平实、面目新颖的专题文学史著作。